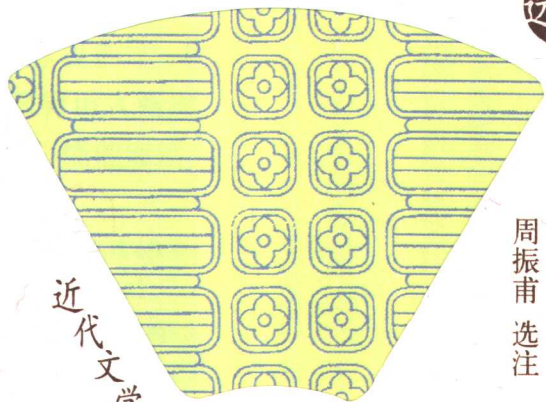


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
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
纵令勉强为之亦未必能得此精义也

严复

集选



周振甫选注

近代文学名家
诗文选刊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严复选集

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

周振甫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严复选集/严复著;周振甫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

(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

ISBN 7-02-003348-2

I. 严... II. ①严...②周... III. ①严复-选集
②诗文-作品选集-中国-近代 IV. I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8530 号

责任编辑:宋红 装帧设计:翁涌
责任校对:宋红 责任印制:周小滨

严复选集

Yan Fu Xuan Ji

周振甫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348-2/I·2559

定价 18.00 元

隔着新世纪的门槛往回看

——写在“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前面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建设、发展，从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带着难以忘却的创痛、带着取得成就的喜悦、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走进了二十一世纪。

一百年前，二十世纪之初的1900年，英、法、德、意、美、俄、日、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烧、杀、抢、掠。一百年后，二十一世纪之初的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在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的今天，在中国人已经站起来和正在富起来的今天，做一番百年回首，看看蹒跚于二十世纪之门的中国，无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之前，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先给中国人送来了资本主义。当大清国那一直闭锁的破败国门被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轰开之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并为现代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所震惊。意识到：此夷狄非彼夷狄，“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财利，其隐赆流溢

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亲见而信之矣，又莫测其所以然”（严复《原强》，《选集》第25页、31页）。于是，“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洋和学习西洋成功维新变法的东洋，希望从那里找到变法图强的良方，因为当时的局面正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所说：

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

然而东西方社会、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使“拿来”也变得不是那么唾手可得。正如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以至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同上文）的情况。由此可以想见，东西方文化间的交融是怎样一种化合的过程。当时的“体用之辩”，即具体反映了两种文化的碰撞。而当新科学、新学科引进中国之后，则大大激发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思想界之活跃，实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声。

在火光血影中写成的中国近代文学，记录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解体和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蜕变的阵痛；记录了一百年前中国人艰难跨入二十世纪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中国人为了民族前途和命运所做出的探索和牺牲。感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民族的神经，往往能提前感知时代的风云际

会。而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则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优良传统。已经站起来和正在富起来的中华民族，到了该让自己“硬”起来、“强”起来的时候了。回顾一百年前中国人的强国之梦，做一番抚今追昔的反思，便是我们编辑“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的初衷。

丛书原拟为十种，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定为目前的七种，一次推出。即：

《龚自珍选集》(孙钦善选注)

《康有为选集》(舒芜、陈迩冬、王利器选注)

《梁启超选集》(王蘧常选注)

《严复选集》(周振甫选注)

《林则徐选集》(杨国桢选注)

《翁同龢选集》(马卫中、张修龄选注)

《秋瑾选集》(郭延礼选注)

其中前四种为我社原有出版物的改版重排，后三种为新书。

所以使用重排本，以其为之做注者都是学界知名人士，可以说“名家”注“名家”。虽注释体例有不尽规范之处，所下断语亦难免带有时代烙印，然释作品背景之周详、注历史典事之精到，则是后来人很难逾越的。加之选注工作被当今学界视为小道，或根本不算科研成果；或在计算成果时大打折扣，致使当今要找到笔下“应有尽有”和“应无尽无”的新注家非常不易。

重排中，我们对旧注本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一、删除“落后”、“反动”等游离于正文之外的空泛政治性结论；二、改正个别不确切的僻字注音和语词注义；三、改正注释中的引文差误；四、

改正原书排校错误；五、与新注本求得大致相同的体例。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旧注本的以下两种情况未做处理：一、征引史料多为撮述，虽加引号，但并非严格引文者，如《梁启超选集》即属此类情况；二、对所注出典有不同见解者，如《严复选集·三月三日……游万生园》：“何曾三起继三眠，却笑万生成万死。”注〔11〕曰：“三起三眠：《三辅故事》：‘汉苑有柳，状如人，号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细味之，三起三眠似当指蚕眠，而非柳眠，即《本草》所谓“蚕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也就是蚕由初生到成蛹的时间。若“一日”之内而“万生成万死”，何乃太速耶？然在做注者已归道山的情况下，此类问题不宜强加于人，故一仍其旧。

鉴于当今注释人才之难得，我们尤其应该感谢为丛书之新选题担当选注工作的几位先生，特别是杨国楨先生。为丛书做注时，杨先生的女儿病情危重；注稿完成之日，正女儿撒手尘寰之时。杨先生在《林则徐选集》的前言中表达了对女儿深深的歉疚和思念，于此我们亦向杨先生和他已故的女儿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请相信，一个青春女孩的生命正以书卷形式在我们中间延续着，我们希望杨先生因此而得到安慰。

有研究表明：1840年前后，中国在世界上还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英国，位居世界第二，远超过德、法、俄等国。当年清军战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武器落后，并不是火炮射程够不着人家，也不是我们的军费投入不够。据史料记载，甲午海战时的北洋水师在舰船吨位、航速、火力等方面与日本海军或是相差无几，或是互有优劣。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

的优长，各装 12 英寸大炮 4 门，装甲厚度达 14 寸，堪称当时亚洲之最，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水平。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无如此规模的装甲防护。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我方均占优势，只有中口径火炮，日本稍稍领先。总起来看，双方实力大体相当，北洋水师并不比日本海军逊色。然而，北洋水师惨遭失败，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舰未沉！人们不禁要问：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一流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答案很清楚：战败的根本原因是清廷腐败无能，军队素质低下。这就是为什么英军拿下一个小小的虎门炮台，却能让整个大清政府屈服的原因。如今，我们切不可忘记历史的惨痛教训。

中国人的强国梦做了一百年了，龚自珍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翁同龢说：“留取世间真道德，看人扼腕献奇方。”（《小游仙》）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秋瑾说：“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梁启超说：“吾心目中有—少年中国在。……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波兰地酒……人固有之，国亦宜然。”（《少年中国说》）

与一百年前相比，我们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全没有理由悲观；但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人家却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与当年的那八个国家相比，我们更没有理由盲目乐观。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百年来，国歌中的这句话其实不止一次在中国大地的上空响起。我们没有时间走弯路、更没有时间走回头路了！好在新中国的几代领导人为我们勾画了越来越明晰的发展蓝图，“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开除球籍”，“中国人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我们葆有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性格，不忘海纳百川、雍容大度的汉唐精神，“聚精会神地”搞建设、谋发展，中国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温故而知新，便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现代意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3.8.

前 言

一 严复所处的时代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这里，毛主席对严复作了正确的评价，他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代表之一，是当时的先进的中国人。这也是对严复给予最高的评价。

在严复(1853—1921年)的一生中，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① 严复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在戊戌政变前。那时候，他向西方找寻真理，宣传维新的理论，是有先进倾向的。但到戊戌政变以后，由于形势的发展，他从先进变成落后，逐渐转向反动了。要了解严复从先进转向反动，就得了解他所处的时代。

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受资本主义侵略奴役的开始。到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清朝的陆海军溃败。下一年，签订屈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辱的“马关条约”，赔偿巨额军费，割让大块土地，帝国主义各国又对中国进行大量企业投资，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奴役加深，使中国更其半殖民地化。接着，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沙皇俄国划定东北，德国划定山东，英国划定长江流域，法国划定西南，日本划定福建，瓜分之祸迫在眼前。当时国内爱国人士，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认为清朝的顽固的专制政治非改变不可，提出变法的要求。由于国内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他们还要求发展工商业，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这两个要求，是要使中国从封建和半殖民地中挣脱出来，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在当时是有它的进步作用的，虽然这种进步作用是有限度的。对待这两个要求，在国内各阶层中主要表现为不同的三派。

一派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他们代表地主官僚的利益，要顽固地保持封建统治。他们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会破坏中国政治的经济的封建机构，所以具有排外心理；但他们更害怕革命会动摇他们的封建统治，便勾结帝国主义来进行镇压，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一派是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他们代表地主官僚和买办的利益。他们和顽固派一样要保持封建统治，要勾结帝国主义来镇压革命。不同的是他们更富有买办性。他们不排外而媚外，他们热心于练新军，制造枪炮，筑铁路，办机器厂，来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这两派都是走投降帝国主义的路，反对变法。一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他们代表从开明地主和富商转化过来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要求政治上取得必需的保障，即取得有限度的民主权利，要求改变封建统治机构，改变专制政治为君主立宪。他们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来代替封建思想。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已经有了商办的工矿企业，维新派正是反映那些企业主的政

治要求。他们是变法的积极倡导者，他们要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从封建和半殖民地中挣脱出来，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不过维新派的进步作用是有限度的，这是由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力量非常薄弱，新兴的资产阶级显得软弱无力。当时资本家的企业还要求封建统治或帝国主义的保护和支助，他们跟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往往有密切联系，这就决定他们不敢走革命的路，不敢彻底推翻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只能走改良主义的路了。

严复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积极介绍者，是维新运动的鼓吹者，他曾经勇敢地攻击顽固派和洋务派，猛烈地抨击君主专制，宣传民主思想，大声疾呼地提出救亡图强的主张，所以在戊戌政变以前，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

二 先进的中国人

严复的先进表现在哪些地方呢？范文澜同志在《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里说：

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沿几千年，流毒无限。清朝统治者，选择一整套封建毒品来麻痹知识分子，务使失去头脑的作用，驯服在腐朽统治之下。这些毒品是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古文经学（训诂考据）等等，所有保护封建制度的东西，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不许有人摇一摇头，其为害之深之广，与象征帝国主义的鸦片（当然不只是鸦片），可称中外二竖，里应外合，要中国的命。以康有为为首的思想家们，公然对清朝用惯了的毒品大摇其头，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

抗科举和八股，所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变成托古改制，拿孔子来对抗孔子，因此，改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当时一整套毒品，受到了巨大的冲荡，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

这里指出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在思想解放上所起的作用。就这方面说，严复比起康有为来还要进步些。严复对于清朝统治者所选择的一整套封建毒品，进行猛烈的攻击。像上文所说，康有为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这种方法是并不如何进步的。因为在陆王和今文里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思想，而当时的学校和策论也并不如何进步，用这种方法来宣扬资本主义思想，免不了武断，免不了牵强附会。这是因为当时的康有为没有到过西洋，没有读过西方资本主义的著作，只能这样做。

严复就不同了，他是英国留学生，在留学时期就研究资本主义思想，读了不少资本主义经典著作。因此，他的攻击清朝统治者的封建毒品，是用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作武器的，这是他比康有为进步的地方。严复在《救亡决论》里猛烈地攻击八股，说八股有三大害：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又说：“悲夫！夫数八股之三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把国家的衰弱危亡，归罪于八股。接下去对程朱理学、古文经学都否定了，指斥它们为“无用”“无实”，“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他不光攻击程朱，还攻击陆王心学，指斥他们“师心自用”，“向壁虚造”，“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这比康有为的尊崇陆王来就进了一步。他拿来攻击一整套封建毒品的，是西洋的进化论。他在《原强》里，一开头就赞美达尔文，说达尔文的著作《物种探源》一书，“欧美二

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的学术政教一时斐变。”他是第一个把资本主义的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他最先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给国人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在国内的思想界引起了震动。康有为称他是“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与张之洞书》）

就思想解放说，严复还有比康有为更激进的，就是提倡资产阶级民主，猛烈地攻击君主专制制度。康有为在变法运动中尽力提倡的是“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别开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商局、工局、矿务、铁路、邮政、会社、海军、陆军十二局，以行新法，各省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他对于民权思想采取回避的态度。他说：“于时复生（谭嗣同）、晦谷（林旭）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同上）严复却在戊戌维新前三年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发表《辟韩》，猛烈地攻击君主专制。他说：“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把封建社会里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诋为“大盗”，斥为“尤强梗”“最能欺夺”，把君权神授说斥为“大盗窃国”，这些，可以说是谭嗣同“仁学”发表以前（《仁学》出版于谭嗣同死后）对君主制度所作的极猛烈的攻击。

严复在《辟韩》里还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理论，对君民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说：

且韩子亦知君臣之伦之出于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织矣，工矣贾矣，又使吾自卫其性命财产焉，则废吾事，何

若使子独专之于所以为卫者，而吾分其所得于耕织工贾者，以食子给子之为利广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

后来维新派中最激进的谭嗣同，在《仁学》卷下里谈到了君主的起源，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这几句话跟严复的论点完全是一致的。在当时，维新派人士不可能对君主起源作出科学的解释，但这种理论却有力地冲击了君主承受天命的迷信说法，是有进步作用的。

严复还用中西事理作比较，有力地用资本主义思想来抨击封建思想，宣传他的变法救亡的主张。他说：“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致化之极则。”（《论世变之亟》）在这里，他要用力今胜古来反对好古忽今，用进化论来反对循环论。他又用西方的自由来和中国的恕与絜矩（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等）相比，认为“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首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骧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同上）又总论西学的命脉所在：“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同上）这里，严复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整套思想来代替

封建的毒素的。但他显然只看到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表面现象而不理解它掩蔽在“民主”外衣下的残酷的剥削本质。

在《原强》里，他对西洋的学术政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途。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本，民主为用。”又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各能自治始。”严复是要用自由、平等、自治来代替封建思想和专制政治。在《救亡决论》里他又非常自信地指出要救中国一定要学西学，主要是格致，即自然科学。在《原强》里他更主张“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已经提出要用资本主义的科学和民主来代替封建思想和君主专制了。所以蔡元培说他“其大旨在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常以此上说下教。”（《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

严复还抨击了当时当权的顽固派和洋务派。他指斥顽固派“苟利而自私”，“不睹西洋富强之效”是“无目”，“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是“狂易失心”！指斥顽固派的贪恋权势，反对变法，“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论世变之亟》）又刻划他们的顽固道：“枯私恃气，乃转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知。彼乘骐驎，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从而指斥他们的误国殃民，斥为没有羞恶，斥为狂悖。（《救亡决论》）他又反对洋务派，认为中国好比病夫，洋务派的举办洋务，好比要病人从事跳高跳远的激烈运动，“十年以往，吾恐其效将不止贫与弱而止也。”（《原强》）他又指斥洋务派的无知，说：“然亦有一二巨子，弛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

咨其实。”(《译天演论自序》)

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卑不足道,严复所颂扬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也充分暴露了它的反动性和虚伪性,但在十九世纪末期,整个中国都还在腐朽的封建统治之下,能够有这样见解,毕竟也是颇为特出的。所以我们说他是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三 从先进到反动

严复的思想从先进到反动,主要是由于时代变化了,而他仍保持原有的观点,甚至是后退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拥戴德宗来变法,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所镇压,康梁逃亡国外,德宗被幽禁,维新党人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害。改良主义者的维新运动就这样失败了。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里说:“一八九四年中国的失败,激起了广大人民的运动。同康有为一派改良变法运动的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其他几个革命派的运动发展起来了。在康有为一派失败以后,他们在1905年组成了革命同盟会。这一派和改良派不同,他们抱着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这就比改良派大进了一步。”这时候,继续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已经失掉了进步作用,被人民所唾弃了。严复在这时候,不仅没有跟着时代前进,反而后退了。

严复不是在戊戌政变后才后退的,在戊戌维新时就后退了。他的具有进步作用的翻译《天演论》和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是在戊戌前三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写的。就在这些著作和翻译里面,进步的和反动的思想同时并存,